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

马庆株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

吕叔湘題



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157号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

马庆株 编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875印张 172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619-0214-X/H·158 定价：3.6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南开大学副教授马庆株关于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的著作。其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曾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本书所收著作还4次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动词和动词性结构的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本书讨论了动词的两个分类系统：时量类系统和自主非自主系统，讨论了持续非持续、自主非自主、程度等语义、语法范畴；描写了动宾、双宾、动补等动词性结构。本书对于多种与动词有关的歧义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从几个方面对动词的语义特征作了说明。从分析方法和开掘深度上看，本书是80年代现代汉语动词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

本书可供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大学、中学语文教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教师及来华留学生参考使用。研究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的计算机工作者也可以之作为研究参考。

Brief Introduction

Classification of the verb, analysis of semantic features are new fields of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nd a mirror of academic trends in the 80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papers report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analysing the Chinese verb and verbal constructions, providing systems of verb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bing syntactic structures such as V-O phrase, constructions with double objects, narrative-complement structures with complement of degree. Analytical methods used here are to describe the distinctive distributions and functions, to transform the surface structures, to analyse semantic features and to interpret ambiguities.

All of these articles had been published, several of them were presented at the 1983 Hefei(2nd), 1985 Kunming(3rd), 1987 Guangzhou (4th) Biennial Congresses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and prepared for the 4th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ymposium held in the Western Hills Beijing.

Because of four papers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won the Tianjin Prizes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Social Science four times; and because of *Volitional Verb and Nonvolitional Verb* he won the Wang Li Prize for Linguistics(Peking University).

序

庆株把他从1981年到1991年所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问题研究的论文编成了两本集子：《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汉语语义语法范畴和词汇问题》。从集子里的文章可以看出，在十年中，他所做的研究工作无论在广度上或是深度上，都是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的。他的进步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十多年里的学术界在现代汉语研究方面的进步分不开。关于这十多年里现代汉语研究方面的大好形势，请参看陆俭明先生的《十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管见》（见《国外语言学》1989年第2期）。

从《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这本集子里的论文看，庆株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我觉得至少有下列五个方面可说：第一是重视语言调查，观察自然语言的各种现象，深入发掘语言事实，重视本地说者（native speaker）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第二是运用层次分析法，即直接组成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这是从美国描写语言学吸取来的方法，不过中国语言学家运用它的时候，为了适应汉语的情况，除切分方法外，还增加了定性。第三是运用变换分析法，这个方法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家海里斯（Z. Harris）。这种分析法是利用两种结构不同的同义或近义句式的集合，组成变换矩阵（transformational matrix），矩阵左边是原句式群，右边是变换式群。原句式群各句的句法结构相同，语法意义一致；变换式群各句也是如此。原句式群与变换式群的句法结构和语法意义的差异一致。中国语言学家运用变换矩阵，并不像海里斯那样，单纯为了验证这些句群的可接受性，除了分化歧义句和给句式分类外，还为了揭示更多的语法规律。第四，为了补充变换分析法的不足，中国语言学家还提出语义特征分析法，如庆株认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区别不仅反映了动词语法功能的差异，而且也大致反映出动词语义特征的不同，自主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记作[+

自主],[动作],非自主动词则可以记作[—自主],[变化]/[属性]。从义素分析角度看,语义特征就是义素。自主动词含有自主义素,非自主动词不含自主义素。不管动词是否含有自主义素,在动词语义结构中总是有自主义素的位置的,这个位置可以叫做自主义位。自主义位的取值是1就是有自主义,取值是0就是没有自主义。设立这个义位可以解释动词在具体运用中自主义和非自主义的转化,即自主义的隐现现象。第五是运用语义指向分析法,中国语言学家从菲尔墨(C. J. Fillmore)的“格”语法里进一步引出“语义指向”的说法,如庆株说:自主义素经常和句中其他单位的语义发生关系,于是产生了义素指向问题。自主义素指向有生命的施事主体,而施事主体不一定占据主语的位置,也不一定出现在句中,因此自主义素不一定指向主语,指向主语只是在施事主体被选作话题的时候。

这本集子里的论文我最感兴趣的是《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这一篇,因为这一篇是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引进了亲属语言对比的方法,使研究跨进了一大步。比如有下列A)、B)两组词:

A)看 听

B)看见 听见

A)、B)两组都是动词,但在语义特征上A)组是一类,B)组另是一类,这两类究竟有什么不同,可以用藏语来对比。看下列藏文拼写形式:

A)lta(看) mnjan(听)

B)mthong(看见) go(听见)

藏语语法称A)组为自主动词,B)组为非自主动词,两组词在形态变化上不一样,在语义上当然也不一样。比如“看书”,我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可以自己作主。但是“看见一个人”,不能说我愿意看见,那个人就出现;我不愿意看见,那个人就消失,因为看见和没看见不是由自己作主的。“见”字在上古汉语里有“出现”的

意思，也有“被”的意思，所以《诗经·褰裳》序里说：“思见正也”，《疏》云：“见者自彼加己之辞。”听和听见的差异情况也是一样的。

在曼谷泰语里也有这样两组差别：

A)du(上阴平,看) fang(阳平,听)

B)hen(下阴平,看见) jin(阳平,听见)

在泰语里，“看电影”说作 du(上阴平)nang(下阴平)，决不能说做 * hen(下阴平)nang(下阴平)。看下面四个对比的泰语语句：

Phom (下阴平) du (上阴平) hen (下阴平) di (上阴平). 我看得见。
我 看 见 好

Phom (下阴平) du (上阴平) mai (阳去) hen (下阴平). 我看不见。
我 看 不 见

Phom (下阴平) fang (阳平) dai (阴上) jin (阳平) di (上阴平). 我听得见。
我 听 得 闻 好

Phom (下阴平) fang (阳平) mai (阳去) dai (阴上) jin (阳平). 我听不见。
我 听 不 得 闻

上古汉语里这两组词就已经有区别：

A)视(看) 听(听)

B)见(看见) 闻(听见)

如《礼记·大学》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甲骨文已有“见”字和“视”字。《说文》“见”字从儿从目，甲骨文从横目。《说文》“视”字古文作“”，陈邦怀先生认为甲骨文作“从示在目上”者一文即古文“视”字，极是。金文有“听”字；甲骨文有“闻”字，“闻”字像跽而举手有所奏闻之形，故特著其耳，为会意字，后世改为形声，《说文》引古文从耳昏声，秦篆从耳门声。这个字初义为“使之闻”，从闻者来说，是非自主的。

台湾龚煌诚先生提交1978年在亚利桑那大学召开的第11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的论文《汉、藏、缅语元音的比较研究》中用汉语“睹”* tag(阴上)跟藏文 lta 对应，可能不太合适。俞敏先生也是用 lta 跟“睹”字对应(《汉藏同源字谱稿》，见《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说文·目部》：“睹，见也。”《广

雅·释诂三》：“睹，见也。”(《广雅·释诂一》：“看，覩，视也”，这条里的“覩”字是“覩”字之误，《广雅》、《玉篇》都说：“覩，视也。”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里已经分辨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见”是个非自主动词，而 lta 是个自主动词，所以不能对应。奇怪的是泰语 du(上阴平)也可以跟上古汉语“睹”对应。请看下列例证：

泰 ju(阴去)< *j-(在)

汉“於”广州 y(阴平)< *ag(阴平)

泰 du(上阴平)< *d-(看)

汉“睹”广州 tou(阴上)< *tag(阴上)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句话，泰语可以说作：

du(上阴平)'a(阴去)rai(上阴平)ko'(阴上)

看 什么 都

mai(阳去)hen(下阴平), fang(阳平)'a(阴去)

不 见 听 什么

rai(上阴平)ko'(阴上)mai(阳去)dai(阴上)jin(阳平).

都 不 得 闻

·我不明白藏语 lta 和泰语 du(上阴平)为什么能跟汉语“睹”对应。

这句话英语可以说做 look but see not, listen but hear not. 可见 to look 和 to see, to listen 和 to hear 至少在语义上各自都是对立的两个范畴。这种对立曾经使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感到困难。他在所著《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1951) 的第十二章《宾语是什么?》这一节里说(见原书第 157—158 页)：

关于宾语有许多定义，其中最普遍的一个是：宾语指出动词所表示的行为所及的人或物。这个定义可以适用于大量的例子，如 John beats Paul(约翰打保罗), John frightened the children(约翰吓唬了孩子们), John burns the papers(约翰烧纸)，但是这个定义很难应用于许多别的语句，而语法学家却毫不犹豫地也使用宾语这个名称，如 John burns his fin-

gers(约翰烧了他的指头),这是说 He suffers in his fingers from burning(他的手指蒙受灼伤之苦),John suffers pain(约翰受苦)等等。

H. Sweet 早就看出了这个困难,他在他的《文集》(Collected Papers, Oxford, 1913, 25页)里说:“像 beat, carry 等,这类动词的宾格(accusative)毫无错误地指出动词所表示的行为的宾语,但对于像 see, hear 等动词说做‘宾语’的,显然只是一种比喻说法(metaphor)。一个人不能挨了打却没有感觉到那打,但他却能看见他一点也不知道的东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对展开在我们视野中的东西并没有行动(action)或是意动(volition),比如在 He fears the man(他怕这个人)这个句子里,其关系尤为逆转,语法上的主格(nominative)实际上是宾语所影响的,而语法上的宾格却表示了起因。”Sweet 结论说,在许多情况下,宾格全无意义——不过最好说宾格使用在普通所给的狭隘定义里是无意义的,只是依照动词本身无限变化的意义而变。

说到这里,我想提出三个问题来:第一,动词的自主和非自主语义特征为什么在藏语里、泰语里、汉语里,甚至英语里都有?第二,为什么建立在印欧语研究基础上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50年代后能逐步影响国内汉语语法研究,并且能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第三,为什么清朝末年的《马氏文通》能按照拉丁语法的构架建立起汉语文法来?而且为什么《文通》在40年代以前对中国读者来说基本上具有可接受性?(请参看王海棻《正确评价〈马氏文通〉的模仿与创新》,见《语文建设》1988年第3期)

马建忠在《文通·后序》里说:“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均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同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

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司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马氏的这个理论跟后来美国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普遍性(linguistic universals)是同类的理论。波兰 Viktor Osiatyński 著《对比—苏美思想家谈未来》(Contrasts: Soviet and American Thinkers Discuss the Future, 纽约, 1984)一书，其第6章《语言与文化》中所述访问乔姆斯基时，乔氏所说的话跟马建忠所说的在要点上几乎完全一致。在语法研究方法上，马建忠和乔姆斯基用的都是演绎法，描写语言学派用的则是归纳法。当然，关于语言普遍性，乔姆斯基要比马氏说得深入得多，也细致得多。美国 Neil Smith 和 Deirdre Wilson 在所写的《现代语言学——“乔姆斯基革命”的成果》(Modern Linguistics — The Results of Chomsky's Revolu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这本书中(第290页)对乔姆斯基的语言普遍性学说有个简洁的说明：“为了描写全部语言，语言学理论必须提供一些途径(mechanisms)。各种成分的或各种特征的词汇常常表现出实体普遍性(substantive universals)；规则的构架和规则的编制，例如全部语言都非要有词组结构规则(phrase-structure rules, 简称 PS rules)不可，也非要有转换(transformation)不可，这就是形式普遍性(formal universals)。在这些规则之上的一些约束因素，例如从一些并列结构中抽去一些项目而能不受损伤，就是功能普遍性(functional universals)。那些出现于每一种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就是绝对普遍性，或者说强普遍性而那些只出现于一些而不是所有语言的描写中，按理论需要提供的(公畹按，如马建忠说‘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则是相对普遍性，或者说弱普遍性。”这段说明里，关于“实体普遍性”解释得不大清楚，我们不妨看看乔姆斯基所写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有黄长著、林书武、沈家煊三位先生的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中的第一章第五节(译本第26—29页)。我引用时，词语

稍有更动)：“实体普遍性理论认为任何语言中的某一类项目必须从一个固定项目的类中引出，例如雅可布逊(Jakobson)的区别性特征理论(*theory of distinctive features*)可以解释为有关生成语法中的语音部分的实体普遍性的一种主张，认为语音部分的每项输出都是由若干成分构成的，这些成分具有少量固定的、普遍的语音特征(也许有15个或20个)，每个语音特征都有不受任何特定语言支配的独立存在的声学—发音特点(*acoustic-articulatory characterization*)。传统的普遍语法(*traditional universal grammar*，公畹按，如《马氏文通》)也是这种意义上的实体普遍性理论。它不仅提出关于普遍语音学(*universal phonetics*)的性质的有趣观点(公畹按，《马氏文通》未设《音韵篇》，马氏认为字形字音是最易变的，故不设篇章)，而且把以下观点加以推进：某些固定的句法范畴(名词，动词，等等)可以在任何语言的句子的句法表现中找到，这些提供了每种语言总的底层句法结构。实体语义普遍性理论可能认为，比方说，每种语言的定名功能(*designative functions*)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完成，因此，它可能认为每种语言将包含若干指称人的词，或包含若干指称某些特定类别的物体、感情、行为等的词项。所以像这样一些实体普遍性在描写语言方面是跟词汇相关的。

描写语言学是对各种语言事实进行有定范围的归纳的、微观的研究，可以找出每种语言各自的细致规律，当然这是很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从宏观上对语言本身作出任何解释，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对语言普遍性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上，也都是很重要的。

是为序。

邢公畹

1990年1月10日

自序

动词和动词性结构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门话题，也是语法研究的关键之一。有人说，动词研究好了，语法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此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自1985年以来为本科高年级和现代汉语专业及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开设了现代汉语动词研究课。我承担了这门课的开课任务，主要讲本人1981年以来所发表的论文，也讲最新的个人研究心得。本书所收文章一部分印作该课程的讲义，另一部分用作讲稿。这门课每讲一次增加一些内容；讲过几遍，就有了一些积累。讲稿片断，作为论文陆续发表。现在把已经发表于《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语言学论丛》、《语言研究》、《语法研究和探索》等刊物的九篇有关文章编为一集，题为《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

本书从语义·语法范畴的角度给动词分类，得到了动词的两个分类系统：持续性动词（包括强持续性动词和弱持续性动词）和非持续性动词，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后者包括变化动词和属性动词，属性动词中包括能愿动词即助动词等）。能愿动词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下面又分出了6个语法小类。本书还讨论了动词与名词性成分的关系（单宾语构造和双宾语构造）、动词带程度补语等问题。

本书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朱德熙先生和陆俭明先生那里学来的。本书所收文章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按写作过程可以分为材料型的和灵感型的两类。材料型的文章如《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从收集材料入手来研究，研究的问题或者是人家研究过而观察角度不同；或者只是举例性地谈过，未作全面调查。写作过程是

做卡片、排卡片、归纳出规律，找可说的话写出来。方法主要是归纳，但归纳当中有演绎。灵感型的文章如《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能愿动词的连用》等，在收集材料之前就已经有了一种设想，即由某个例子的启发而突然产生了关于某类词或句法结构的新的想法，也就是一种理论的解释或理论的萌芽。这新想法还得用大量例子来验证是否站得住，如果不能证伪，还要用大量的材料来证实。写这种文章主要用演绎法，在演绎当中有归纳。

以上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和写法，下面谈谈本书的用处。

1. 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参考。1991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语文题中有这样一道：

下列每个词语只表示一个意思的一组是

- A 差一点儿 气死了
- B 说好 挤多了
- C 摊一下 等了三天
- D 想起来 踢了三十个毽

答案在本书中可以找到。这个题考查考生对句法结构的理解力，虽然凭语感也可以答出来，但教师只有知其所以然，了解其中的规律，才能给学生讲清楚，才能更好地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教学质量。这就要求教师关心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新的进展。

2. 可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教师参考。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教的教师须要掌握更多的语法规律。本书所揭示的汉族人习焉不察的现象背后的规律、对动词和动词性结构的细致描写，有助于教学。

3. 可供研究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的计算机工作者参考。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鲁川教授说：“《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能愿动词的连用》、《动词后面时量成分和名词的先后次序》等论文对我国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学界

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马庆株在现代汉语动词方面的突出贡献，显示了他在科学上的很高的造诣。他提出的系统的理论成为我们工作中重要的指导理论之一。”

4. 可供语法研究工作者和语法爱好者参考。在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工程的推动下，8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从本书中或可窥豹一斑。本书所收文章大多被国内外学者引用过，有些被反复引用，被博士生、硕士生列为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大半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有些还在会议报导中作了重点介绍。学术前辈给了很高的评价、很多的鼓励。华萍在介绍80年代中期以后相当活跃的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青年一辈学者时首先提到我，真是愧不敢当。尽管如此，本书大概还是值得关心汉语语法的读者翻一翻的。陆俭明教授关于《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两句话或可说明这一点，抄录如下，聊当鞭策：该文“从汉藏语比较入手全面地考察、研究了汉语的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极有创见”。此文“价值在于首次论述了汉语中实际存在的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的对立，而这有助于解释前人无法解释的许多语法现象；在研究方法上，文章引进了亲属语言对比的方法和将语义、语法结合分析的方法，这无疑使汉语语法研究跨进了一大步；文章对于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亦有重要的实际参考价值”。

下面谈几点想法。

1. 语法是个系统，研究时应该注意系统内的关系和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样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就能站得高些，眼界就能开阔些。

2. 语法这门学科应是具有可验证性的比较精密严格的学科，而不应该是随意的。基本说法都应该通过论证，然而不少的基本说法还没有认真论证过，例如在语法分析中设立各类基本句法结构的必要性，述宾结构小类和宾语小类的确定。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探讨了述宾结构这种基本句法结构的歧义，提出了内部歧义

和外部歧义这一对概念。要使语法学精密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还应该树立计算机意识，自觉地为计算机提供精确的语法结构模型，为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服务。这样，给词分小类，弄清各类（大类和小类）词的分布特征，就很自然地成为语法研究的关键。分布特征的研究是基础工作，大有可为。

3.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和各种语言的共性。为了发现特点，我们的手脚就不能被印欧语语法书中的条条束缚住。汉藏语的比较，使我们发现了汉语中有而印欧语语法书中没有讲过的自主范畴。这种范畴既有共同的语义成分，又有共同的语法特征。汉语语义范畴（语义特征）和语法范畴（分布特征）有对应性。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语法上对立的各种表现与语义上的对立的相应关系，说明自主非自主既是语义范畴，又是语法范畴，可以称作语义·语法范畴。探讨语义·语法范畴，是在语法研究中将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的有效方法。语义特征和分布特征二者的研究，应该而且可以结合起来，这使得语法具有解释力，解释力来自二者的相应关系。这种相应关系可以说明汉语特点，例如能愿动词及其连用格式的研究为说明汉语是最接近于数理语言的自然语言这一设想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证据。

4. 为了发现语言共性，我们应该继承马建忠以来语法研究的遗产，同时注意借鉴国外语法学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科学无国界，语言有共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来的语法理论中一定有对各种语言普遍适用的东西，只要有解释力，就可以拿来用。语言必定有语法，才有条理，才能被理解，才能用来传递信息；不同的语言有共性，才有可能翻译，有可能对比或比较。由于没有万能的方法，因而要全面描写汉语语法，给它一个全息摄影，就须要用多种方法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通过扎实的研究，包括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研究，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发现语法规律，发现汉语语法与其他语言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样不仅可以建立起汉语语法理

论，并且使它日臻完善，从而有助于开创汉语语法研究的新局面，还一定能大大丰富和发展一般语法学的理论。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付梓，一是为了回顾本人80年代在动词研究方面走过的一段路，就正于时贤，求得读者的批评指教；二是为了省去读者翻检的工夫，免去同行、研究生、语法爱好者索要复印的麻烦；三是为了改正初次发表时的排印错误。虽然主观上希望拿出的东西可以代表自己的水平，虽然各篇文章自问还都是下了工夫的，但学步时的摇摆在所难免。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不同的文章对个别事实的分析不尽一致，但都尽可能保持初次发表时的面貌，大小论点均不做修改。只是统一了体例，个别文章局部地恢复了初稿的原貌。

我能在语法研究上做一点工作，应该感谢导师朱德熙先生、林焘先生和陆俭明等先生，是他们把我引入语言科学的殿堂，带到语法科学的前沿，使我起点较高。先生们的耳提面命，对多篇文章的赐教，使我终生受益。

我能在语法研究中不断进取，应该归因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造成的浓厚的学术氛围，应该感谢南开大学校系领导和邢公畹、刘叔新、宋玉柱等先生的指教、鼓励和鞭策。还应感谢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会较早(1983.2)批准我为该会正式个人会员并连续五次邀我出席年会，感谢《中国语文》杂志社连续多次邀我出席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

拙作能减少错误，应该感谢学术会议上师友、代表的指正、赐教。拙作能编成集子联系出版，应该感谢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四次为本书中的论文授奖，感谢北大王力语言学奖金评选委员会把《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评为获奖作品，使我得到王力奖获得者的殊荣，受到极大鼓舞。

本书在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能顺利出书，应该感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该社为繁荣学术、支持语言学事业，慨